

■人物素描

# 周天勇:务实为先力主渐进式良性改革

□邓敏

他是一名经济学者,却因执笔一份政改报告无意间社会知名度大增;他的学生,除了少数年轻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外,更多的是地厅级以上的高级官员;他的调研报告,因直言不讳不仅在社会引起共鸣,更多次得到中央领导批示。

他便是周天勇,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一位在夫人眼中“颇有良知的学者”。

## 破格直升的博士生

祖籍河南南阳的周天勇出生于青海省民和县,中国最偏远的地区之一。“五岁我就和父母去了山区,在大山里住了八、九年。小时候在回族山村念书,初中在十五里外的镇上,每天要翻过两座大山才能到学校。”几时的艰辛,周天勇似乎不以为苦;“在大山里的几年,现在想起来,是人生最宝贵的一段时间。在那里,我与少数民族的孩子一起玩耍,和回族藏族同学一起学习,一生都对回族、藏族等少数民族怀有感情。”

1973年,周天勇一家回到民和县城,但他高中仅念了两年便下乡插队,在农村当了一年多农民,后在公社里任干事、会计。1980年,周天勇于以优异成绩考入东北财经大学,主修基本建设经济。

“当时国内财经院校的专业科目设置非常广,财政、税务、会计、商业无一不包,还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部门经济学。”大学四年的苦读为周天勇以后的研究乃



至党校执教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周天勇走上经济学治学之路却并非一帆风顺,1984年周天勇报考硕士研究生意外落榜。此后五年的留校执教生涯,让学校和他后来的博士生导师汪祥春见识到这个年青人的毅力和才华,于是,1989年周天勇以本科生的身份被汪教授破格提为博士生,主攻劳动与经济增长。对于已八十多岁的恩师,周天勇一直心怀感激:“几个月前我还回东财去看望过

他,老人还挺精神,身体不错!”言语中透出亲昵与怀念。

## 党校执教十三年

1994年,周天勇来到北京的中共中央党校经济部任教。“原来是黑板经济学,到了党校可就大不一样了。”由于中央党校的教学对象是中共各级领导干部,下至地区、县委领导,上至省部级高官甚至中央决策层,针对他们的特殊情况,周天勇的备课更加严谨与全面。“这些学员都是带着很多实际问题而来,希望在党校找到答案。我们一要特别熟悉情况,可能比这些领导干部还要熟;二要有充分的数据与案例,才能对他们有所启发;三是自己必须要有足够深入的研究,要有自己的新想法、新思路。”

当然,与学员的交流是双向的。在与中共各部门高级干部就当前中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交流意见的过程中,周天勇也自称获益匪浅。“这几年各级干部理论素养有明显的提高,对许多问题看法都很深入。我早些年有几本专著,就是在这样的教学过程中形成的。”

## 执笔政改报告 力挺“渐变”

去年夏天,一份中央党校的政治改革研究报告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这份报告从经济视角阐述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到一党执政体制下的国家法律至上,党管军队、党管干部、党管新闻;政治上适度集中,经济上向市场经济迈进;土地使用权交给农民;县、乡级直选;党不具体干涉司法等当前中国社会的一系列敏感问题。一时之

间,舆论反响强烈。作为报告的执笔人之一,周天勇不仅得到了众多支持,也遭到了不少谩骂,甚至被某些人斥为“替党立宪摇旗呐喊”。

“我是一个务实的人。中国现在确实有很多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而且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也必然要求政治有所变革。但我们应该避免像前苏联那样政治上的动荡,那会对我们的民族、国家造成极大的伤害。”周天勇并不讳言自己是“渐进式政改”的一贯支持者。“所谓渐进并不是要维护旧体制。中国政改的目标是坚定的,但不一定要采取动乱的、破坏式的方法。我主张采取不引起动荡的、良性的政改,这对国家、民族、社会、个人都有益。”

周天勇坚持认为,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但这并不是说党不需要改革。相反,我一直认为必须在党内民主、党的执政方式、党的机构精简等方面有所改革。但在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大国里,在当前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期,只有共产党才能稳定国家,而政治稳定,才能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在周天勇看来,除了通过立法加强人大监督力度、农村基层直选,将政府职能由行政管理转变为公共服务、确定党员干部任期制度等显性政改措施外,一些看似毫不相干的举措同样暗示着本届中国政府正进行着一场“静悄悄的政改”:大力发展民间组织,城市社区自治中的业主委员会正蓬勃兴起,普通民众监督、维权意识日益增强;扶持行业协会、民间商会、中介组织,在政府、企业、民众之间搭建

桥梁;健全相关法律,新修订的《公司法》将传统意义上的党管干部与企业领导干部市场选择相结合;政府预算改革,加大透明度、接受人大监督,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

尚不为人知的是,周天勇等人现在正着手起草另一份政改报告,“和一报告不一样,这次要更深入一些。”据透露,这份新的政改报告主要研究的是党的体制改革和政府体制改革,以及人大国家权力机构、两院司法体制的改革,同时包括社会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等。“主要探讨在国家权力机构、政府、司法之间能够形成现代制衡关系,使政府、社会组织、自然人和企业法人之间形成良性制衡结构。”

## “真正从学术角度考虑问题,就不要过于在意社会评价”

或许因为血液中流淌着西北汉子的耿直豪爽之气,作为一名经济学者,周天勇的文章素以大胆直言著称。早在1995刚到党校不久时,周天勇的一篇关于国有企业与银行债务重组的内参报告就得到了两位分管副总理的批示。此后数年间,关于水电开发、公平与效率、政府乱收费、官民供养比、创业和就业、民生问题等一系列研究报告不仅有中央领导的批示,某些数据和言论被媒体披露引用后曾产生强烈冲击波。一万亿的政府乱收费和乱罚款、一比十八的官民供养比,这些闻之动容的数字总是让人不禁为他捏着一把冷汗,而他却很坦然:“经济学家要成为国家和老百姓的智库;只要是出于真正的学术角度来考虑问题,就不要过于在意社会的评价。”

■经济学术思潮追踪

# 寻租研究 让产权理论更靠近世界真相

□梁怡

“经济租金”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学范畴。在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中,它的外延逐步扩大,现在一般的教科书将之解释为:支付给资源所有者的款项中超过那些资源在任何可替代的用途中所得到的款项中的那一部分,即超过机会成本的收入。而在关于“寻租理论”的众多文章中,却将其定义为:由于不同体制、权利和组织设置而获得的额外收益;中国学者普遍接受的定义则是:凭借某种天然的或人为的社会原因,限制某种商品或服务的供给量,从而使其市场价格稳定地高于成本而形成的、一种长期的超额利润。

对于寻租也有多种定义,例如在布坎南等学者的笔下,“寻租”一词是要描述这样一种制度背景化的行为:在那里,个人竭尽使价值最大化造成了社会浪费,而没有形成社会剩余”,——他们把寻租描述为人们凭借政府保护进行的寻求财富转移而造成浪费资源的活动。总的来看,广义的“寻租”,是指人类社会非生产性的追求经济利益活动,或者说是指那种维护既得的经济利益或是对既得利益进行再分配的非生产性活动;狭义的“寻租”,是指利用行政法律手段来阻碍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自由流动、自由竞争,以维护或攫取既得利益。

寻租理论的思想萌芽于“公共选择理论”之父——Gordon Tullock 1967年的一篇文章。但作为理论概念则要稍晚些,由美国经济学家 Anne Krueger 1974年在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一文中提出。在这篇论文中,她深入研究了因政府对外贸管制而产生的租金争夺,并设计数学模型对其展开讨论,因而Anne Krueger被视为寻租理论的奠基者。在此后的十多年中,寻租理论获得长足发展,不仅为包括社会学、政治学、行政管理学在内的诸学科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视角,而对于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创新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众所周知,以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是以一系列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假设为前提的。例如,关于经济信息完全和对称的假设,企业和个人经济活动无外部经济效应的假设,企业作为价格接受者对市场价格的形成毫无影响力的假设,交易成本可忽略不计的假设,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减的假设等。新制度主义的经济学家们虽然对上述假设作了一定程度的修订,但其理论框架根本上还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之上的。例如早期产权理论在排他性产权方面的研究,并没有建立起有关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模型,而是通过比较排他性权利的成本和收益以及众人分析产权的内部控制成本来解释,排他性权利为什么被或没有被确立,并认为在产权的原始模型里,资源配置可以达到帕雷托最优。这就类似于新古典经济学描述的完全竞争市场。

上文提到的早期产权理论指的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开始,科斯、阿尔钦、德姆塞茨和张五常等学者用新古典主义研究方法研究产权起源问题所形成的理论。由其研究方法所决定,早期产权理论不可避免地具有这样几点缺陷:无法解释无效产权的存在原因;因抽象掉政治和国家因素而导致了对其的不完善分析;关于产权主体的“单一”和“同质”分析掩盖了其中的利益矛盾,从而降低了新古典经济学对现实的解释力。

由此看来,要克服早期产权理论的缺陷,推进产权理论研究的进展,引入寻租理论的分析思路不失为一个佳选择。因为早期产权理论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问题:有利于个人或企业的产权选择不一定对社会是有利的。因此,将利益集团及国家因素考虑在内以后,由于个人或企业选择的制度环境已发生变化,寻租的产权选择可能更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当然这种个体的利益最大化,不一定有利于全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因为这种在寻租下的产权安排可能是以损害其他利益集团的利益为条件的。

美国经济学家Benson Bruce证明了寻租理论是产权理论的一个扩展,他论及如下:

一是从目标及分析范式来看,寻租理论与产权理论两者具有某种一致性。寻租是对特权的一种寻求;而产权,是外在性的内在化。有效的产权安排会导致寻利的竞争市场和社会环境,而无效的产权安排或产权失灵则会导致寻租的社会。

二是仅仅运用交易成本方法分析产权问题还远远不充分。交易成本方法的目的,是试图建立一个政治经济制度的一般理论,重点是建立交易成本和国家一起决定产权结构并因而决定经济绩效的方式。这样,在新古典经济学资源稀缺的假设前提下,利益最大化假设主要揭示人类利益之间的一致性,而寻租则主要揭示人类利益之间的矛盾,从而解决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产权主体“单一”、“同质”的问题。

所以,引入寻租理论后的产权理论对现实世界的真相更靠近了一大步。因为它向人们揭示了:人类对产权形式的选择不仅受产权变化的成本—收益的制约,还受到利益集团及国家的制约。

# 存款保险制度宜循序渐进分步建立

□郝佳 齐玮

在央行把存款保险立法和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列入今年工作日程后,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进入了“快车道”。宏观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和金融体系的平稳运行,为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提供了有利的内部环境;银行业治理结构以及法律、会计等相关配套制度的逐步完善,为存款保险制度提供了良好的内部条件。另一个推动因素是,我国金融体系的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温总理一个月前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六项任务,其中一项就是切实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和安全。“两会”上存款保险制度成为金融业的热门话题,银行业代表、委员纷纷建言献策,探讨存款保险的制度建设。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存款保险在世界范围内如火如荼,全球约有9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虽然在很多国家存款保险制度被证明能够有效保护存款人的利益,提高公众对银行的信心,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但是也有一些国家(例如日本)由于制度设计存在缺陷,致使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问题十分突出,存款保险制度反而加剧了银行系统的不稳定性。有鉴于此,我国应该以深入研究本国经济发展、宏观经济环境以及文化传统的特点为基础,循序渐进推进存款保险制度,不可奢望一蹴而就。

由于体制原因,我国银行类存款机构历史包袱较重,盈利水平普遍不高,各类银行及信用社等机构的实力相差较大,因此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应选择分步建立的模式:即在全国性的存款保险制度建立之前,先在隐含存款担保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过渡性的存款保险制度。可以先建立低层次的、地区性的存款保险制度,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全国性的高层次存款保险制度;可以先让内控机制较好的存款机构,如股份制商业银行组建存款保险体系,内控机制差的机构等到内控机制改善后再建;也可以先同时建立几个保险体系,然后逐渐将几个体系合并成一个或两个体系。将存款保险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适当分开,可能更容易为各方接受。

笔者认为,可以先选择内控机制较好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试点组建存款保险体系,使银行间形成相互监督的激励机制,并使存款保护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因为股份制商业银行所有制结构相同,经营

目标相近,能够创造一种共同体意识,将各个银行之间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存款获得担保,一方面将增强其存款业务的竞争优势,鼓励银行业将竞争的重点转移到提升服务质量上去,另一方面可为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运作积累丰富经验。我国农村信用社体系的信用问题最为严重,应加快其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在其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经营机制搞活后,方可建立一个相应的存款保险体系。至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则暂且考虑存款保险制度试点,因为除中国农业银行之外的三大商业银行的股份制度改革都已取得明显成效,公司治理结构、内部风险控制、财务状况都有明显好转,所以其抗风险能力较强,不是存款保险制度重点约束的对象,可待存款保险制度正式推开后再加入。

除了法律、会计等配套制度的改革外,证券业和保险业保障基金制度的顺利推出和成功运作也给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因此,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建设应与金融体制的深层次改革结合起来,在充分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于国情,分阶段稳步推进,坚持速度与效益的统一,以充分发挥存款保险制度的保障功效,切实维护我国的金融安全。

■来自日内瓦

# 复活节与复活节经济

□徐天惠

上周末是复活节。在西方,复活节是一年中最具宗教气氛的节日,也是民间迎春的日子。在这个节日里,人们通常都要放下手中的活计,穿上新衣、除旧布新,庆祝耶稣的复活、迎接春天到来。因此,除了传统上的宗教含义外,更有许多民间色彩。这有点像中国的春节,在神圣中不乏欢乐,并由此形成了独特的节日经济现象。

在复活节里,鲜花、彩蛋和复活节兔子是必不可缺的。鲜花作为复活的象征、春天的象征,容易理解,而彩蛋和兔子与耶稣的复活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西方文明中,蛋具有多子多孙和复活的象征意义,后来基督教将这一意涵赋予了新的涵义,即它是基督的象征,未来的生命就是从其中挣脱而出世的。现在,人们之所以将蛋染成红色,既是代表了基督受难时流下的鲜血,也象征了复活后的快乐。

同样,由于兔子有很强的繁殖能力,常常又被视为是新生命的创造者,由此,兔子也成了西方复活节的一种象征。所以,复活节时,许多家庭会将一些食品制成小兔和彩蛋,作为礼物送给小孩和朋友。

对于西方人来讲,复活节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节日。从公元4世纪开始,他们就开始庆祝一年一度的复活节了。过去,许多西方国家会在复活节举行盛大的宗教游行。但现在这个节日已渐渐失去了以往的宗教色彩,而代之以越来越强烈的民间特色和地方特色。也就是说,复活节也带有非宗教的色彩的一面。

公元2世纪,复活节起源于异教徒的节日。古老的撒克逊人在这天庆祝他们女神Easter的诞生。当基督徒们注意到很多部落开始庆祝Easter时,他们试图转变他们的信仰到基督教上来。就此,基督徒们慢慢地扩展了他们的信仰,但他们允许这些部落依旧庆祝异教徒的节日。Easter的

降生和耶稣的死复活发生在同一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Easter转变成了基督教庆祝的节日,他们命名这个节日为Easter(复活节)。

复活节兔子成为复活节的象征,是来源于异教徒的那个节日。他们的女神Easter被通过盎格撒撒克逊人的土地的象征(兔子)来崇拜。兔子也代表肥沃和成长(春天)。

当然,我们也许更要注意到复活节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就如同中国的春节经济一样,复活节也会刺激旅游、贸易和服务业等商业活动增长,对经济活动产生一定的影响。

可以看看一个案例。根据近日以色列商会联合会发布的信息,复活节期间,以贸易及服务行业等商业活动有望实现增长,并将有5500名左右的失业者找到工作。

也许,这就是我们为何要关注复活节的缘故,因为复活节会拉动相关的经济活动。

最后,祝大家节日快乐。

■本期人物话语



## 努力促进央企又好又快发展

李荣融(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在最近一期的《求是》杂志上撰文说,中央企业是我国国有经济的主体和国民经济的中坚,肩负着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重任。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的背景下,中央企业要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大力增强国有经济的影响力、带动力和控制力,进而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多声道

## 以市值取代净资产 是上市公司考核趋势

巴曙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4月7日在上海举办的第三届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金圆桌”颁奖典礼暨高峰论坛上表示,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推进,以市值取代净资产,将是后股权分置时代上市公司考核的必然选择。中国的上市公司是否能够顺应正在深刻转换的市场发展的要求,从原来的净资产管理转向更为市场化的市值管理,将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着上市公司发展的空间以及整个资本市场资源配置能力的改善程度。

## 有选择地逐步放宽 对跨境资本交易限制

吴晓灵(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4日在印度孟买举办的“中印金融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中国将逐步放松对资本的控制。在风险得到有效防范和加强资本流向监控的情况下,将有选择地逐步放宽对跨境资本交易的限制,今后需要采取的措施,控制贸易顺差的不断增长。贸易顺差水平过高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今后需要采取的措施,控制贸易顺差的不断增长。这些措施包括提高国内需求,说服更多中国企业投资海外、鼓励进口等。

## 中国仍将以适度规模 借用国外贷款

张晓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4月6日在北京表示,外汇储备全球第一的中国仍将以适度规模、创新方式借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虽然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已高居世界第一,银行存贷差庞大,整体资金供给形势已非短缺而是过剩,但由于储蓄转化为投资机制不畅等原因,目前中国资金供给仍还是过剩与短缺并存,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公共资金缺口很大。中国借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要注意区域协调发展,突出行业重点,着力提高利用国外贷款的质量和效率。因此,中国会合理、审慎使用国际商业贷款。

## 我贸易顺差刚触“警戒线” 基本正常

牟新生(海关总署党组书记、署长)4月6日在《经济日报》撰文提出,我国积极利用外资的政策和特有的贸易结构,决定了我国贸易顺差现象将长期存在。国际上判断贸易是否平衡,通常用贸易顺(逆)差额与当年进出口总额相比,在10%以内的为基本正常,这个10%也可称为贸易失衡“警戒线”。2006年我国贸易顺差1775亿美元,约占当年进出口总额的10.1%,刚刚触及“警戒线”。比较当前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德国54年以来贸易顺差的情况来看,目前我国存在的大额贸易顺差基本是正常的。